

沉醉于科学与音乐一生的普通人

——纪念国际第四纪科学大师 Nicholas John Shackleton 教授

周 力 平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

2005 年 12 月,我到英国进行短期学术交流。象往常一样,我下飞机后打电话联系的第一位英国朋友就是 Nicholas (Nick) John Shackleton 教授。虽然 Nick 身体很弱,他仍然和我聊了很久。他说,他的病情波动很大,他特别提到,几天前在和汪品先教授通电话时,他实在支持不住,未能和汪老师谈完明年古海洋学会议的事情,对此深表歉意。

今年 1 月 25 日中午,负责剑桥大学 Godwin 实验室质谱分析的 Mike Hall 先生把我和一位在实验室工作的意大利同事叫到一起,显然他有重要的话要说,认识 Mike 的 20 年以来,我从未见过他如此的神情,他极力控制着自己,十分悲痛地告诉我们,Nick 昨天晚上离开了我们。如果这个消息不是来自这位与 Nick 合作了近 40 年的同事,我是不会相信的。我前一天还向 Mike 提出去看望 Nick, Mike 告诉我 Nick 这时可能不愿有人去看望他,尽管我知道 Nick 的病情于前一周的星期四开始恶化,但是我一直相信 Nick 能象前几次一样战胜病魔,继续为国际第四纪研究把舵。Nick 走了,他走得太早了,太突然了。他给我们的事业留下的东西很多,大家都很熟悉。当韩家懋老师让我为《第四纪研究》写篇纪念文章,我想我最好是写写大家在文章里不容易看到的,可一时竟想不出从何写起了。以前每天见到 Nick 与他的秘书和助手同在一间 20m² 的办公室一起工作的情形,每天和我们一起喝咖啡、喝茶,在他家里排练音乐,在教堂或学院礼堂的演出,……,一历历又浮现在眼前,他既是一位科学大师,又是一位普通的人,这将是永远的记忆。

几乎是整整 20 年前,我从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来到剑桥大学的 Godwin 实验室做热释光测年实验,在我的导师温特尔博士帮助下,我住到了离火车站不远的 Nick 家里。那时, Nick 刚搬家不久,一天吃早餐的时候,他问我如果他找到资助,我是否愿意来剑桥攻读博士学位,我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之后,在温特尔博士的帮助和 3 位老师(刘东生先生、德比希尔教授和 Nick)的推荐下,我获得了奖学金,并于 1986 年 10 月到 Nick 工作的 Godwin 第四纪实验室做研究。这个实验室很特殊,它建在植物学系,但又和植物系不在一个楼里,只有两名固定科研人员,均是学物理的,还有一名技术人员。这里每年都有一些国内外的同行来访问, Nick 总是把来访的同事介绍给我们这些学生,就这样,在办公室或是在那间十几平米的实验室茶室里,我们结识了不少那些以前在文献上读到的第四纪同行。也许是大家有过这段在 Godwin 实验室的经历,这里毕业的学生一直保持着对第四纪古气候研究的强烈兴趣和信心,再大的困难和干扰也难以动摇,是的,这一事业有着广泛的国际基础。现在,当学生们问我对这一研究领域前途的看法时,我总是像 Nick 一样首先告诉他们当前第四纪研究在国际上的状况,然后介绍中国第四纪研究在我国地球科学中的位置,以及北大的第四纪年代学和第四纪古生态学的研究条件,由他们去选择。

Nick 对中国第四纪研究十分关注,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他第一次访问中国后,回到剑桥就做了一个关于中国第四纪研究情况的报告。他对我国的黄土古气候研究给予极高的评价,并利用各种场合向国际同行介绍刘东生先生领导我国第四纪科学家们取得的丰硕成果。尽管他去黄土高原的次数有限,但是在平常的交谈中,我可以体会到他对中国黄土的深厚感情,在他的办公室墙上一直贴着丁仲礼同志 20 世纪 90 年代初寄给他的红粘土剖面照片和邀请他合作研究的信件。Nick 和黄土专家 George Kukla 教授是老朋友,他一直鼓励 George 等美国科学家与安芷生老师的国际合作。当我们和俄罗斯的 Dodonov 教授以及塔吉克斯坦的 Ranov 教授等合作完成了中亚塔吉克斯坦黄土的磁化率测量以后, Nick 马上将我们的结果与安老师的中国黄土结果

进行对比,提出了欧亚黄土新的时间标尺,并讨论了黄土堆积速率与全球冰量变化的关系。Nick 对这项工作特别有兴趣,我记得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很高兴指给我看他一口气写出的那几页文稿。初稿完成后,Nick 出差了,我们把稿子寄给合作者们修改,之后就投到“Nature”,审稿人提了不少意见,Nick 领着我们进行了修改,结果又返回来一堆我们认为没有太大意义的问题,并要求再修改。Nick 说,咱们别耽误时间了,建议改投“Quaternary Proceedings”。这样,我们的这项工作很快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我也不知道这刊物算不算 SCI 刊物,用现在的观念看,可能有点可惜,尽管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是,毕竟离“Nature”已经很近了。

Nick 的第一篇“Nature”文章是他做博士论文时发表的,我一直很相信他对“Nature”文章的把握,这在我提交第一篇文章时得到了验证。记得我把博士论文的磁学部分写成文章后,请教 Nick 是否可投“Nature”,Nick 给我的回答是值得试一试。由于在做这部分工作时我与他进行过一些讨论,我问他能否将他的名字放上,他说他对这篇文章的贡献还不足以作为作者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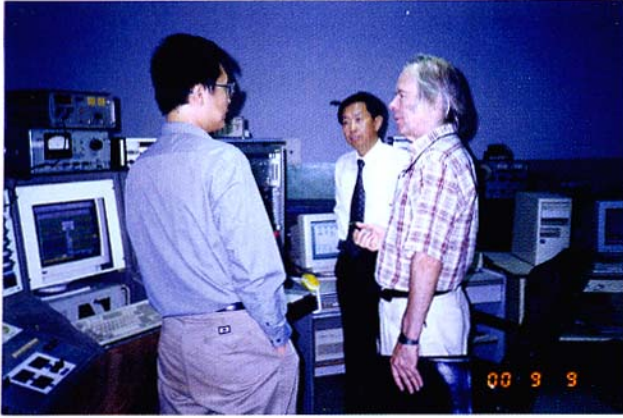
1998 年底,我和 Nick 一起研究地磁极性倒转界线在黄土和深海沉积物中的差异,我把初稿交给他,他看完后,指着稿子的后半部分关于黄土剩磁形成机制的段落,说他不懂这些,建议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删去。我采纳了他的建议,删去了相关的段落。交稿之后,Nick 很高兴地说,这项工作将来会很有用。也许现在人们会更想听到自己的工作是否有意义或者是否重要一类的评论,Nick 所说“很有用”的含义我是后来才逐渐体会到的。我 1999 年 10 月回北京大学后,Nick 一直关注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并鼓励我彻底搞清这个问题。他 2000 年来北京时,参观了与此研究相关的北大加速器质谱实验室,还专门会见了陈佳洱校长。会见是在北大临湖轩进行的,尽管 Nick 和陈校长谈得很好,他还是觉得有点不习惯这么正式的安排。但是,他对北大有一批很好的加速器物理专家感到十分高兴。

作为学术大师的 Nick,他的光彩并非来自那些耀眼的奖牌,我们平常看到更多的是他在系里一次次学术报告后的讨论时迸发出的学术思想火花,他提的问题总是那样切中要害,而又有所启发。Nick 专门和我们讨论问题的时间并不多,但每当和他讨论,他总是毫无保留地提出他的想法,鼓励大家去探索。我们最受益的是他经常能给我们指出一些相关

的前人工作(尽管他不直接从事这些研究),如果他了解不够多,他就会说他不懂并向我们建议有关专家。有时他先读到与我们的研究关系密切的新文章,他会将那篇文章翻开,并亲自将那期杂志放到我们的书桌上。Nick 的文献都装在纸盒里,到过他办公室的人都记得架子上放的那几十个编号的盒子,与这些纸盒配套的是按作者姓名排列的老式卡片。Nick 的近万篇文献对我们一直是全部开放的,这一切使我们深深感受到一位大师的胸怀和渊博,这也是他具有凝聚力的原因之一吧。

尽管有人觉得很难跟上 Nick 的学术报告,但是他每次出去开会前都要进行紧张、认真的准备。他平常外出开会不少,但多数是学术会议。Nick 在实验室从不召集开会,我记忆中,除了每年的圣诞节聚会和会餐以外,十多年里我们实验室总共开过两次会,而每周系里的学术报告他几乎场场都到。Nick 对他自己能坚持在一线进行科研感到很自豪。虽然他基本不亲自操作质谱仪,但是他一直坚持自己挑有孔虫。2001 年底中国教育电视台到欧洲摄制世界一流大学的系列片,第一站是剑桥大学,当记者林一博士采访 Nick 时,他指着身边的一台显微镜说,你们可以将这个拍下来,他告诉林博士,只要有时间,他就会用这台显微镜挑选用于稳定同位素分析的有孔虫。随后,他指着办公室门口书架上一排排大洋钻探报告说,他的事业成功与他所从事的深海研究全面开放的国际合作有很大关系。在实验室里,他告诉记者,他花了好几年攻读博士学位,其主要研究工作就是设计和制造一台可以高精度测量少量有孔虫样品的质谱仪。他说,现在这种仪器可以买到了,但是,年青人可能因此而失去真正懂懂质谱原理的机会。

Nick 在英国学术界享有盛誉,但是,他很少出现在媒体上。我记忆中他只在剑桥的地方报纸上出现过一次,这就是 1998 年他被女王封为爵士时的采访。他对荣誉的态度很独特,尽管他把被封爵(即成为 Sir Nicholas Shackleton)看作很高的荣誉,但是女王在白金汉宫授予他爵位时,他既不要录相,也不要照片,后来在实验室同事劝说下,他好像订了照片。Nick 得过许多大奖,每次得奖,他就在上午的咖啡时间或者下午的茶点时间,把奖牌拿到茶室请大家看,并请大家吃巧克力蛋糕,这种巧克力蛋糕在我们实验室是最受欢迎的,有时他还会买上几瓶法国香槟酒,请实验室的同事们喝。不过,这类庆祝一般都不会超出我们的常规咖啡、茶点时间,之后,大



照片1 Shackleton 教授2000年
参观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



照片2 Shackleton 教授对中国一贯友好,1995年他与
出席XIV届INQUA大会的中国代表在一起

家继续工作。

Nick 是位美食家,有一次他和来访的同事谈论要再次光顾伦敦的一家湘菜餐馆,使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以前只知道他是泰国菜专家,这一条还记录在有关 Nick 的国际人物传记中,他告诉我他真的学习过做泰国菜。Nick 也很喜欢中国的饺子,每次请他和我一起包饺子,他总是欣然接受并兴致勃勃地试着包。我在剑桥学习、工作的那些年里,几乎每个周六都会看到 Nick 来实验室工作,有时工作一忙,他到傍晚才想起要去买菜,这时他会赶紧冲出去,到离实验室不远的露天菜市场去采购。Nick 家里没有电视机,但是当午饭时间实验室的电视机播放世界杯等国际大赛的节目时,偶尔,Nick 也会一边吃着三明治,一边目不转睛地看上一会儿球赛。有一次,他一边走出茶室,一边评论说,高水平的球赛还真是挺有欣赏价值的!

我不记得 Nick 前几年的假期安排,后几年里,他每年的夏天休假就是和夫人一起去英国北部一个音乐大师班进行一周的音乐活动。几乎每个周日 Nick 都和朋友们演出或排练,Nick 有时会告诉我们,他和夫人以及其他朋友们那个周末要排练的曲目。Nick 的黑管演奏是专业水平的,据说他还录制过唱片。他还是有名的黑管收藏家和黑管历史学家,他曾让我参观他收藏的黑管,小小房间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黑管,门口还有一个小工作台,是他修理黑管用的。他将收藏的宝贵黑管借给朋友去演出,得到了他的音乐朋友们的高度赞扬。他2000年来中国访问时,还带了一支黑管,一天晚上我们去他在北大未名湖畔的住处接他出去吃饭,我们进门时,他在吹黑管,他说这支曲子是为来接他的那位刚从剑桥回来、喜欢音乐的小朋友演奏的。他告诉这位小朋友,他以前是吹号的,在部队服役时还是军乐队的,后来才改黑管。我们多么希望他能再到中国来看看他的第四纪朋友们,到北大未名湖畔来往几天,带上他的黑管为更多的年青人演奏几只优美的曲子。

2006年5月6日上午11时 Nick 所在的学院 Clare Hall 在剑桥大学有500余年历史的圣玛丽大教堂为他举行了追思仪式(memorial service),来自英国、欧洲各国、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的350余位同事和朋友参加了仪式。教堂入口处展示着一双 Nick 最习惯穿的皮凉鞋以及两幅照片,一张是他在显微镜前的工作照,很显然,这是他生病以后照的,另一张是曾经挂在 Nick 办公室墙上的他演奏黑管的照片。在牧师的主持下,大家以传统的感恩祈祷方式缅怀 Shackleton 教授这位大师在科学和音乐上的巨大贡献。与 Nick 共事近40年的 Hall 先生首先朗读了圣经中一段颂词,随后,Elderfield 教授介绍了 Nick 的生平,黑管手 Champion 朗读了题为黑管与猫的短文,历史学家 Waterhouse 先生回顾了 Nick 的黑管收藏及对黑管历史研究的贡献。其间 Nick 读书时所在的 Clare 学院唱诗班演唱了 Purcell 和 Brahms 谱曲的圣经段落,大家两度起立共唱 Goss 和 Byrd 谱曲的颂歌。仪式以 Nick 的音乐朋友们用黑管演奏音乐而结束。

Nick 走了,他的第四纪古气候研究事业还在,他的音乐还在。